



产业结构调整 与金融支持研究

黄明 胡舒予 / 著

CHANYE JIEGOU TIAOZHENG
YU JINRONG ZHICHI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产业结构调整 与金融支持研究

黄明 胡舒予 / 著

CHANYE JIEGOU TIAOZHENG

YU JINRONG ZHICHI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姗姗
责任校对:许奕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研究 / 黄明, 胡舒予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90-0631-5

I. ①产… II. ①黄… ②胡… III. ①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研究 IV. ①F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0824 号

书名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研究

著者 黄明 胡舒予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0631-5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张 8.25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前 言

产业水平是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水平的提升产生着重要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过程中，不论是优势产业的发展、劣势产业的退出，还是产业之间技术结构的优化，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和供血系统的金融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金融体系的系统性支持是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基本保证。

本书在回顾国内外产业结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产业结构理论，详细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接着剖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对工业化进程及面临的困境、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的协整性进行分析，并对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理论、金融手段的运用比较、金融模式的定位选择等论题进行探讨。金融业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重要作用，本书的核心是将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评述	(1)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4)
第三节 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	(11)
第二章 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关系	(17)
第一节 城镇化与城镇就业关系的理论基础	(17)
第二节 城镇化与城镇就业的发展模式	(22)
第三节 中国工业化进程及面临的困境	(24)
第四节 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的协整性分析	(29)
第三章 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理论基础	(37)
第一节 金融发展的基本理论	(37)
第二节 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39)
第三节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40)
第四节 产业的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	(41)
第五节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机理	(43)
第四章 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手段的运用比较	(46)
第一节 德国的全能银行制	(46)
第二节 美国的风险投资与新经济	(49)
第三节 日本的政策性金融	(54)
第五章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作用分析	(58)
第一节 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机理	(58)
第二节 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金融与经济增长	(61)
第三节 金融深化理论与金融约束理论	(64)

第四节	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渗透差异性	(66)
第五节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系统性风险	(67)
第六节	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	(68)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模式的选择和构建	(70)
第一节	我国产业结构及金融体系的演进	(70)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问题成因	(75)
第三节	我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效果分析	(85)
第四节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政策	(91)
第五节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模式	(95)
第七章	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	(102)
第一节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条件	(102)
第二节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分析	(103)
第三节	金融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105)
第四节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模式	(111)
第五节	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112)
第八章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与建议	(116)
第一节	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116)
第二节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体系	(122)
第三节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	(123)
参考文献	(126)

第一章 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评述

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比较深入,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起步较晚,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的实证分析较少,把研究深入产业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更少。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借鉴前人对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的后续探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研究起源于发展金融学家的探索。在18至19世纪,李嘉图、巴杰特和熊彼得等外国学者认识到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认识到银行创造信用的功能促进了资本流动、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在1966年,帕特里克(Partike)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提出了需求带动(Demand Following)和供给引导(Supply Leading)的金融发展问题。文章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引导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带动型金融逐渐取代其主导地位,此研究发现揭开了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索进入系统化、理论化研究的序幕。

此后,金融发展理论逐步兴起,以美国经济学家肖(Shaw)和格利(Gurley)为代表。他们认为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金融中介的发展是建立有效率金融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可以促进储蓄与投资的形成、提高投资效率。1969年,戈德史密斯(Gold Smith)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①他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确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并运用到实证分析中,通过统计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为代表,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

^① 根据戈德史密斯的定义,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总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麦金农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制，扭曲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不能真实反映货币的供求关系。肖提出了金融深化论，认为完善的金融体制能引导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良好的经济反过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论掀起了研究的新高潮，许多经济学家纷纷提出独特的新见解。Kapur 研究了劳动力过剩且固定资本闲置的欠发达封闭经济中金融深化问题。他认为，在固定资本闲置的条件下，企业能获得多少流动资金便成为决定产出的关键因素，而商业银行对经济的作用就是提供流动资金。Galbis 在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使资源无法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克服金融抑制，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Fry 认为，投资的规模与投资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货币金融因素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纷纷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对金融发展理论模型进行计量验证，检验其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20 世纪 80 年代，Lanyi 和 Saracoglu 对 21 个发展中国家在 1971—1980 年间实际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了计量验证，得出实际利率与实际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998 年，Levine 和 Zervos 研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用最小二乘法对 47 个国家 1976—1993 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的发展不仅与同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生产率提高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也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率提高的很好的预测指标。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许多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刘世锦（1996）是较早关注金融与产业问题的国内学者，他认为金融发展的着眼点要放到促进产业发展上，提出“金融改革和创新要有利于产业升级和发展，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以此作为衡量金融改革和创新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

谈儒勇（1999）^① 借鉴理查德·查尔斯·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1993）的经验分析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曹啸和吴军（2002）^② 考虑到谈儒勇的研究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补充检验，结果显示金

^① 参见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当代财经》1999 年第 10 期。

^② 参见曹啸，吴军：《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和特征分析》，《财经研究》2002 年第 5 期。

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伍海华、张旭（2001）^①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三者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以及我国产业发展中金融模式的选择问题。其主要观点有三方面：一是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为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并且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上述传递过程越明显；二是在主导产业选择模式方面，我国应选择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以银行主导型为主、资本主导型为辅的产业金融政策，以及市场主导型金融为主、政府主导型为辅的金融体制；三是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宏观金融政策方面，应强化中央银行产业金融政策的主导地位，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注重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注重发挥以利率政策为核心的金融杠杆作用。

罗美娟（2001）^②以证券市场与产业成长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了市场在一般条件下证券市场促进产业成长的机制，尤其关注在发展过程中证券市场推动产业成长的条件。她认为证券市场对产业成长的推动作用是通过证券市场启动核心企业，核心企业成长对整个产业形成带动机制来实现的。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选择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她指出，仅仅通过国家产业政策还不足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快速转换，必须把产业政策与融资过程中的产业选择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推动产业快速发展。在证券融资过程中进行产业选择，是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利用证券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不同之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应当是证券资本配置的重点。

曾国平、王燕飞（2007）^③利用中国1952年至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得出金融发展整体对产业结构变迁有长期效应。石经克（2012）^④、黄汉钰（2011）^⑤、王培志和刘雯雯（2015）^⑥、方静（2016）^⑦分别对柳州、广西、山东、安徽的区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一致显现出各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具有积极的作用。

综合来看，国外和国内关于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以下研究空间：

① 参见伍海华，张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② 参见罗美娟：《关于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6期。

③ 参见曾国平，王燕飞：《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财贸经济》2007年第8期。

④ 参见石经克：《柳州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第9期。

⑤ 参见黄汉钰：《广西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研究》，《区域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

⑥ 参见王培志，刘雯雯：《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关系研究》，《东岳论丛》2015年第7期。

⑦ 参见方静：《浅议安徽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滁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 国外学者偏重于研究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变化基本上是一种遵循自然演化的过程，因此，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支持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

(2) 国内学者对金融与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组织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起步较晚，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对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度不够，尚未建立起一个整体框架，未能清晰地阐述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具体影响机制，缺乏对现实经济中不同形式的金融活动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系统性研究。

(3) 在实证分析方面，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影响的研究也比较薄弱，缺乏对中国情境下不同金融形式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影响效应的系统性实证检验。

三、总体评述

从国内外的整体研究现状来看，直接将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仍然为数不多，大部分学者都将研究聚焦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既有研究虽然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中金融支持的作用，但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却没有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另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和经验分析阶段，相应的定量分析较为缺乏，影响了相关研究的说服力，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仍然对本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一、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在其著作《政治算术》里，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发现工业的收入比农业的收入高，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的收入高，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业流入工业，再从工业转入商业，并推断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存在差异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不同。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于威廉·配第之后，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明了分工理论，讨论了分工带来的巨大效用，并追溯到分工产生的根本原因。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带来了同样劳动力下更多的工作量，劳动分工引起个人利益的增加，通过个人产出的交换，促使社会各阶层普遍富裕，最终，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导致社会总产量的增加。

新西兰经济学家弗雷希尔 (Frisher) 在威廉·配第的产业结构变动理论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统计数据于 1935 年出版著作《进步与安全的冲突》。书中最先提出并使用三次产业这一概念，并将经济产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个

层次，产业结构理论有了雏形。

产业结构理论对揭示三次产业中劳动力的流动规律非常重要，但是，真正阐述经济增长与劳动力产业分布之间的相关关系，应该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1940年，克拉克出版了《经济发展的条件》，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产业的劳动力投入与总产出进行了比较，发展了威廉·配第的收入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学说，将农业和工业制造业归入第一和第二产业，其余经济活动归入第三产业，并得出如下结论：农产品的需求将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商贸流通业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因此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收入的提高存在一定规律性，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制造业转移，进而向商业服务业转移。该结论被经济学界称作配第-克拉克定律。

库兹涅兹（Kuznets）于1941年首次提出国民收入这一概念，并论述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重要关系，通过对大量经济史料事实进行研究，发现了库兹涅兹产业结构论，即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着年代的延续，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均不断下降，工业部门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占比也呈上升趋势。库兹涅兹将产业结构重新划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部门，并使用产业部门的相对国民收入来衡量产业结构。

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工业化，优先建立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能否最终获得突破的关键在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4）、乔根森（Jogenson，1967）、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odaro，1970）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两点缺陷：一是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二是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是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研究的逐步深入衍生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钱纳里（Chenery，1995）对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同总量增长的关系做出了概括，认为产业之间存在关联效应，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结构改变与“赶超”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另外，钱纳里着重对影响经济结构变动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如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认为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是不变的，并指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产值与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移基本是同步的，但在发展中国家，产值结构转换往往先于就业结构转换。范艳丽（2008）^①认为，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替可以用来刻画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并以三次产业的产值为基础构造了区域的产业

^① 参见范艳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定量测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

结构高度化指数。张玉春等(2011)^①通过构建工业结构高度化的综合评价模型比较评测了江苏等多个省市的工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在有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评价研究中,刘思峰等(2004)^②主张以产业结构有序度指标来刻画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伦蕊(2005)^③认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产业结构所具有的自组织能力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内涵。李博、胡进(2008)^④提出假设,即最优的产业结构必须满足总投入结构与增加价值结构一致的前提条件,进而基于静态的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总投入结构偏离技术经济结构的水平,以此来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程度。干春晖、郑若谷(2011)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Feng和Sun(2012)为了揭示区域综合运输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使用协整理论分析了上海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与货运和客运量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客运与货运总量占GDP的比例预测货运需求已经不再适应,并认为中国交通系统的优先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

以上研究文献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探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对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持和干预研究,而对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虽然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金融体系和金融机制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在具体研究中也针对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机制进行了相关理论探索,大量的实证研究也为以上理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佐证,但是必须承认,由于不同的研究中所选择的样本区间和指标不尽相同,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当前有关金融与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依然未能构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框架。

二、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罗斯托(Bristow, 1960)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通过研究各国经济发展效率间的差异,发现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都存在一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部门。罗斯托认为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正是这些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迅速扩大的结果,这些行业能够在整体上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全面增长,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

^① 参见张玉春,余炳:《江苏工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测评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② 参见刘思峰,唐学问,党耀国:《产业结构有序度研究》,《经济动态》2004年第9期。

^③ 参见伦蕊:《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本测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④ 李博,胡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和比较分析》,《管理科学》2008年第21期。

赫希曼 (Hirschman, 1958) 认为, 由于存在资源稀缺和企业家缺乏等因素, 经济不可能平衡增长, 因此应该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重点发展一部分产业, 并以此带动和扩大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 投资上的不均衡使需求与供给也出现不均衡, 带动关联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形成整体发展。

日本学者赤松要 (1956) 在对明治初年以来日本产业发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日本某一产业的发展依次经历进口、生产和出口等时期, 而后进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 (进口替代)—出口”三个环节的继起, 引申形态从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 过渡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Llord (1996) 从雁行理论的视角主张在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实施动态的产业转移, 即投资国可按本国生产成本的排序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产业转移。

筱原三代平 (1957) 提出产业结构规划的两个原则: 收入弹性原则和生产率上升原则。收入弹性原则是指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 因为该类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 生产率上升原则是指选择优先发展生产率上升快、技术进步率高的产业作为受保护的幼稚产业, 增加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这两个原则后来成为日本政府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基础。Sonobe 和 Otsuka (2001) 通过分解劳动生产率得到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Peneder (2003) 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了 2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特定产业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得到某些特定产业的结构改变有助于经济增量的波动。

Martin Zagler (2009) 认为经济结构的改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成本, 即较高的失业率。他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产业结构变更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发现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都会存在高于均衡水平的大量失业现象。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使得外部贸易壁垒发生变化, 在此背景下, Breinlich (2008) 认为通过兼并和收购可以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 加拿大的公司通过兼并与收购使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增加了 70%, 使资源得到整合。兼并与收购不仅仅使得资源转移, 而且资源使用效率也有所提高, 产业整体质量得到提升。

Humphrey 和 Sturgeon (2005) 认为, 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生产网络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全球化使产业在某些重要城市集聚, 使得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整。Rachwal (2011) 考察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下就业结构和国民总产出的影响, 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资本集中、技术进步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等是导致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外部原因。

Chunmei 和 Duan (2011) 发现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高碳时期, 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 碳排放稳定在一定水平, 第三产业同低碳指标高度正相关, 因此在资源约束情况下, 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调整产业结构。

刘伟和张辉(2008)^①实证检验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降低,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需要进行修正才能适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Tomasz和Rachwa(2011)研究了波兰相对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包括波兰产业转型中产业结构变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变化,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对波兰就业结构与生产附加值的影响,以及波兰产业分支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中出口的变化,国外投资资本对产业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作用。

张湘赣(2011)^②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产品严重产能过剩的同时,第三产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在世界经济亟待复苏的背景下,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改善投资与消费比例、扩大就业、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Wei和Liefner(2012)研究了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重视改革历程与经济地理理论的应用,强调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交互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产业政策理论

保护幼稚产业免受国外竞争的主要理由,是为了让其缩小与国外先进竞争对手的差距,但是大量文献在分析政策保护对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的影响时(Matsuyama, 1990; Miyagiwa, Ohno 1995),通常仅选择本国与外国的两家企业,分析其在产业政策保护下企业数量固定的古诺竞争(双寡头竞争模型)。这种针对单一国内企业的研究忽略政策保护的主要目的,即从新兴产业到成熟产业的过渡。这种单一企业模型不能解决产业技术扩散的问题,例如贸易保护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间技术转移的速度和可能性等;也解释不了贸易壁垒对不同演进模式的企业是否具有相似的影响力,即随时间转移的企业净进入比率。这些都是认识产业保护影响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保护是否有利于缩短幼稚产业的技术差距。

Ederington和McCalinan(2011)结合幼稚产业保护与产业动态的双重视角,探讨了幼稚或新兴产业是否应受到产业政策长期保护的问题,认为产业政策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内部的进入与退出动态,长久保护可能导致企业过早采用产业保护政策,降低了企业采用新技术和发展创新的概率。同样,与长久保护相比,缩短保护期虽然会导致企业更

^① 参见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② 参见张湘赣:《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0年年会学术观点综述》,《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1期。

快地采用新技术，但仍将降低给特定公司采用新技术的概率。最后，以公司数量灵活性为特征的产业，保护期的变化不会改变新技术采纳的比例，反而会增加重新洗牌（大规模净退出）的可能性和规模。

但是，也有大量的文献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明显。Fan 和 Chihiro (2006) 分析与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产业技术政策，发现两国政府通过制定有效的产业技术政策提高技术水平，对这两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升级做出了巨大贡献。政府应充分认识产业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制定符合当地社会和经济现实的产业政策，同时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本地经济。

Wong (2011) 对东南亚的创新方式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东南亚形成的关于产业政策机制、租金及寻租行为的框架，这个框架建立在东南亚一系列工业化现实的基础上，揭示了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可以通过改善经济租金的功能性创新系统环境，促进产业技术进步，获得技术外溢，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类似的产业政策同样存在于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新兴经济体。Hodler (2009) 研究了市场失灵下的产业政策的成效，引入公共代理人负责产业政策的制定，并假设代理人拥有有限的信息和政治动机，进一步假设企业进行寻租，发现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产业结构是无效的，当代理人具有高度政治动机时，产业政策往往是有效的。比如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产业政策一直比较成功。

窗口指导是日本银行通过与商业银行的日常业务往来，对它们的资金周转、贷款计划等方面，以“道义劝说”为主要形式的干预，刺激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目前，窗口指导仍然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与产业结构调整工具，即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动向，规定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与贷款变动数量，以此间接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行为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方向保持一致。付俊文和赵红 (2008) 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窗口指导货币政策工具在实践中存在不足，仅局限于转发或贯彻总行具体的信贷政策文件、货币政策建议书，或个别指导形势分析会和行长联系会，且窗口指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四、产业升级理论与新兴产业理论

产业升级理论可追溯到 Raymond Vernon 于 1973 年提出的工业生命循环论。他认为一个产品从出现到被普遍使用大致要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产品所需要的投入要素是不同的。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推移，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并形成产业的区域间转移，原产地则从事更有竞争力的产品生产。该理论被后来研究者发展为梯度转移理论，即不同区域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是非均衡的，逐步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生产力的空间推移，是从高梯度区域（该地区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向低梯度区推移的（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素质受到限制的不发达地区布局，处于成熟阶段后期和衰退阶段的产业部门，形成低梯度地区）。

产业升级的概念由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诠释。Porter (1990) 认为，在资本相

对较为充裕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就是制造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形式向高附加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过程。Ernst 为了使产业升级的概念易于理解,归纳了5类产业升级。①产业间升级:产业层次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移动。②要素间升级:生财要素层次从“禀赋资产”向“创造资产”(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移动。③需求升级:消费层次从必需品向便利品、奢侈品移动。④功能升级:价值链层次从销售、分配向最终的组装、测试、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移动。⑤链接上的升级:前后链接层次从有形的商品类生产投入到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其中后4类属于产业内升级。Kaplin Sky 和 Readman 区分产业升级与创新的差别:创新指相对于自己先前状况开展的公司改进或开发新产品或工艺;升级指相对于外部竞争者,公司如何快速适应环境的变化。

Murphy (2007) 研究了巴西社会空间因素和城市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认为产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产业升级有较大的影响。Gereffii (1999) 和 Gibbon (2001) 从全球价值链、商品链角度对产业升级进行研究,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不断淘汰落后技术和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下,世界各国间的联系对产业升级有重要影响。研究强调产业升级过程中相互学习的必要性,其引致的产业先进技术与国际技术转移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动力。Azadegana 和 Wagner (2011) 认为产业升级是使产业技能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对于一个后进入市场的企业,通过剥削形式的创新,可以从底层向制造和设计的高端进阶,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唐晓云(2012)对产业升级理论进行评述,从技术创新、创新政策等多个方面总结了影响产业升级的相关因素,认为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很薄弱,在全球生产和投资国家化背景下,对产业升级的研究必须与全球价值链分析融合在一起,并将技术创新全球化及国家创新政策等关键因素引入其中,通过比较优势将宏观层面统一起来,才能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深化、有所创新。

新兴产业是一个重要的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论题,这种忽视或者缺乏是由于一系列对理论和实证的挑战所导致的,造成对新兴产业的研究较难推进。

新兴产业是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Low, Abrahamson, 1997),是产业生命周期模式随时间演化的产业(McGahan, Argyres 等, 2004),也是产业生命周期中最紧迫的一个时期。不同行业的这个初级阶段时间跨度有所不同。如何精确界定度量新兴产业的时间范围呢?这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Low 和 Abrahamson 认为产业步入成长期就意味着新兴产业阶段的结束,一些学者将紧迫期过后的时期特征描述为成熟、合法、稳定等(Aldrich, Ruef, 2006; Klepper, Grad, 1990)。Klepper 和 Graddy (1990) 的研究发现,一些新产业可能仅需2~3年即可进入稳定期,而另一个新产业也许需要50年才能逐渐稳定。

新兴产业领域研究缺乏的重要原因没有可行的研究数据。最近的创业领域研究不再强调创业活动的历史背景,而倾向于支持定量研究方法(Chandler, Lyon, 2001),因此需要对新兴产业从萌芽开始建立档案。Forties 和 Kirsch (2011) 对新兴产业领域研究的核心

问题进行了梳理,对学者在更加深入研究新兴产业可能使用的数据类型进行了列举。为了帮助学者找到和利用这些数据, Forties 和 Kirsch 阐述了历史档案的潜在作用,认为新档案的建立能够保持新兴产业的相关记录,强调了学者长期参与新档案建立的必要性。

衰退产业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衰退阶段的产业,针对衰退产业的研究集中在衰退产业的战略、组织生态、组织从衰退产业中的退出行为以及对某个国家的衰退产业的研究等(黄传荣,陈丽珍,2012)。Harrigan (1980)指出,由于衰退产业面临的环境不同,采取的战略也不相同,可选择的战略包括早退出、抽出投资、有选择地收缩、保持现状、增加投资等,应根据产业结构、需求特点、市场竞争状况及自身的优劣势制定恰当的战略。Sihvonen (2010)分析了不同衰退条件下的战略形式,包括衰退产业的勘探者、防御者、分析者以及反应者等。黄传荣、陈丽珍(2012)对衰退产业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指出企业规模的大小和多样性、退出成本、产业生命周期以及退出的形式是衰退产业退出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家复兴战略中如何协调新兴产业、衰退产业及其他产业的配置,也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成功的区域复兴在于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协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库克,1990)、哥德堡斯堪的纳维亚地区(Dahlstrand, 2007)和新西兰奥塔哥南方地区(Perry, 2007)的成功案例。然而,现实中区域复兴的问题却并没得到理论研究的充分支持,如何处理新兴产业与现存的成熟产业甚至衰退产业的关系,被研究者所忽视。

Arbuthnott、Eriksson 和 Wincent (2010)将辩证法和社会运动理论运用于区域产业兴起研究中,提出新兴产业在传统与衰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中崛起的模型。模型说明了区域产业兴起的四个流程,包括构造过程、运动动员过程、产业间相互渗透过程和辩证的新老产业更迭过程。这四个流程共同作用形成了区域的新兴产业,定性描述了新兴产业进入、成熟产业防御、保护自身商业利益,新兴产业自身塑造的理念,配合主导传统产业,通过克服紧张与冲突,新老产业渗透合成,最终推动了区域产业的复兴。

第三节 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

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应,既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又可能严重地阻碍经济发展。为发挥产业结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避免其阻碍作用,就必须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就是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各产业协调发展,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具体来说,